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ZANG CHUAN
FO JIAO
WEN HUA
XIAN XIANG
CONG SHU



菩提树下

——藏传佛教文化圈

扎 洛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菩提树下

藏传佛教文化圈

扎洛 著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菩提树下

——藏传佛教文化圈

扎洛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20 万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册

ISBN 7-225-01306-8/B·20 定价:13.70 元

出版导言

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民族。因为历史和地理的缘故,藏族文化长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光大。随着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本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这个雪域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量介绍和研究,正在形成一股新的人文热潮。

以新的形式和角度,较系统、多层次地介绍藏传佛教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取精华以飨读者,使关心藏民族的社会各界朋友对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青藏高原这一人文新大陆有一理性认知,是我社出版本丛书的主要目的。

我们坚信,人类的精神食谱不会拒绝丰富,凡有益的营养必将增强身心。这一点,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文化)也不例外。而作为一项文化工程,一项需要付出大量劳动和心血的事业,本丛书的出版只是一支序曲。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扎洛(bkra—zhis Don—grub),男,藏族,1969年出生于青海省兴海县,1986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就读民族史专业,1991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有关藏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曾在《法音》等杂志上发表数篇论文。

前 言

藏传佛教文化产生形成于青藏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之中,但是,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雪域藏疆,也不单单是藏人一族,在历史的波涛长河中,藏传佛教文化不仅浸透了阿里、卫藏、多康三藏大地,还远播到了今天的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傈僳族、门巴族、珞巴族、蒙古族、满族地区,以及国外的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原苏联的中亚和远东地区等等,在亚洲中部广袤的高山草原区内形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藏传佛教文化圈”。这一文化圈自古以来联结着中原黄河文明、印度恒河文明、西亚两河文明等东方文明的三大发祥地,并且汇纳百川、博采众长、标新立异,以浓烈的雪域高原气息和独特的藏民族风格别树一帜,异彩独放。

“文化圈”,或者称之为“文化区域”的理论,本是西方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核心学说。他们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域,就构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区”。在文化圈内,有的民族或部落在中央地区,有的则在边缘地带,在边缘的常常和别文化相混杂,渐渐脱离本区文化的性质,在中央的则被认为是本区文化的标准,因为本区文化就是从这里生成和传播的,所以又称为文化中心。文化圈内从中心到边缘之间,依其标准的文化特质的多少可

分为若干文化带,标准的文化特质最多的地方便是中央带,即文化中心,周围则依文化特质的递层减弱而形成若干文化带。他们依据这种方式来研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本质,并追溯每一种文化是从何处发生、又经何种途径传播到何处等问题。传播学派(特别是美国历史批评学派)的这一理论,通过纵横两向的考察研究,准确地把握了文化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人类学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的文化学研究中仍起着理论中坚的作用。

我们运用“文化圈”理论的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观照整个藏传佛教文化圈,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中把握藏传佛教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价值意义,而且还指导我们通过对文化圈内部结构的建构与分析,进一步明晰藏传佛教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传播过程。

那么,如何建构藏传佛教文化圈的内部结构呢?

一、以山南、拉萨为中心的卫藏地区是整个文化圈的核心区域,即文化中心。

这里不仅是藏族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的最先立足之地。佛本之间最早的碰撞、认知、认同,以及藏族人对佛教的加工改造,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里又成为佛教文化最发达、佛教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其表现在宗教上,不仅各大宗派长期并存、寺院林立、僧人众多,而且也是新思想、新观点的最早诞生地,在宗教思想上具有一种领先地位;表现在社会生活上,佛教的义理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可谓是“浹于骨髓而润于四体”,佛教与藏民族水乳交融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则是全民信仰佛教;表现在政治经济上,政权与教权混杂不分,合二而一,互为依托,互相支持,最终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些文化因素

的复合,表明藏传佛教在卫藏地区已成为一种内容庞杂、体系完整的高层次文化,其高度成熟的状态表明它在功能上具有向外辐射的力量,文化圈内的藏传佛教文化就是由这个中心向外呈波浪式散射的。

卫藏地区在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中心地位,还表现在它有一种文化的内聚功能,圈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文化都在这里交汇、集中,经过佛教文化的改造和整合之后,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向外传播。因此,“卫藏中心”的观念,不仅在藏族地区,而且在文化圈内的许多民族中,同样根深蒂固。

二、文化的发展就是不断冲破旧的躯壳,在深度和广度上探寻新的领域。藏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过程,就是藏传佛教文化向外传播、辐射的广延过程。从整个藏传佛教史来看,它的向外传播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潮,即: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各大宗派形成时期以及格鲁派建立之后。这三次大的传播高潮使藏传佛教文化在空间上获得了巨大的拓展,自卫藏向四周递层形成了三个大的传播区域,这种呈波浪状、递层向边缘延伸的传播格局即是文化圈内部的主体结构,我们将之概括为三大层次区域:内层区域、次层区域和外层区域。

内层区域主要指青藏高原上以藏族聚居区为主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的藏传佛教文化是在吐蕃时期随着其统一大业的完成而播及的,是文化圈内最早的传播区域,这些地区在宗教上直接受卫藏地区的影响,政治上受“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因此也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和全民信教的社会基础,文化上同样具有向外传播的能力。内层区域实际上是扩大了的文化中心,它在文化圈次层区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次层区域是指在青藏高原周围从高原向平原过渡的山地丘陵地带。藏传佛教后弘期初,各佛教流派与称雄一方的封建实力集团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各大宗派,从此,宗派利益与世俗利益混杂不分,它们在争夺“正统”旗号下的封建割据斗争日趋激烈。各宗派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纷纷向外发展,寻求新的“化宇”,于是,藏传佛教文化冲破了内层区域的界限,植根于青藏高原边缘的许多民族之中。

从另一方面来说,自古以来分布在青藏高原周围的许多民族和国家,如北方的土族、裕固族、西夏古国,东部的羌、纳西、普米、怒、傈僳等族,南方的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以及门巴、珞巴等族,其历史在11—14世纪时,都不同程度地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古老的原始文化尚未解体,那些重视巫术、祭祀、迷信崇拜的原始宗教特色,以及侧重于现实人生与经验人生的文化本质,与急剧变化着的社会政治、经济不相适应。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形成于阶级社会中,具有丰富内涵的高层次文化体系,它的传入适应了这些民族历史发展的需求,极大地丰富、完善、深化了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

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在次层区域的传播中,藏传佛教文化始终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势,并最终成为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和核心。

外层区域是指广袤的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的一些圣山名城。蒙古草原的王公贵族和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们,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心理需求出发,邀请藏地的高僧大德们前往传法,特别是格鲁派兴起以后,这种往来联系盛况空前,藏传佛教由此而远传蒙古、汉地,并一度高享尊宠与荣华。但是,政治上的劣势地位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始终使藏传佛教文化处于被支配的

地位,这也预示着在外层区域藏传佛教文化更易受到其它文化的挑战和取代。

当然,三大层次区域的区别并不意味着有几条明确的界限可划,而只是反映了标准的文化特质在空间上的逐渐递减过程,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在文化圈内各民族、各地区间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历史现象。

本书就是以上所述的三大层次结构为主干展开论述,在总结概括藏传佛教文化的形成历史及其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以及在各民族、各地区所表现出的个性特点,试图揭示藏传佛教文化在文化圈内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意义和特殊魅力之所在。

目 录

前言.....	(1)
---------	-----

上篇——文化圈的内层区域

一、雪域高原的菩提之树	(3)
神灵之域/初沐佛雨/文明的历程/法轮常转	
二、菩提树下的沉思与微笑.....	(41)
苦难人生/般若波罗蜜多/凡人能成佛吗？/即身成佛的秘密之法/菩萨的学问	

中篇——文化圈的次层区域

三、西北荒原的圣迹之谜.....	(89)
辉煌河西/佛国西夏钩沉/圣地柏域噶波的五色彩虹 /点格尔汗的呼唤	
四、东巴与喇嘛的对峙	(130)
东巴与汗规的境界/乱世怙主木氏土司/盛衰普化寺 /感知圣人们的灵犀	
五、喜马拉雅之巅的祥云	(163)
极地诱惑/门巴：从美丽的处女地到隐藏的白莲圣地 /静龙之国/喜马拉雅之子：菩提亚人	

下篇——文化圈的外层区域

六、蒙古草原的佛风 (193)

佛的旨意：向北……/燥烟弥漫的元朝宫廷/俺答汗
的业绩/不屈的萨满/草原文化的建构

七、梵号高扬：从清凉山到紫禁城..... (240)

清凉胜境与金刚界五尊/明武宗的冤屈/三世章嘉活
佛与乾隆皇帝/双向赞赏

后记..... (279)

上篇——文化圈的内层区域

一、雪域高原的菩提之树

雪域高原，一方庄严、圣洁的土地。

当几百万年前，它在亚洲中部冉冉隆起时，像一把不断延伸的利剑，直刺向烟云苍穹，似乎硬是要让它的子民们与那些出没于烟雾飘渺中的凶神恶煞们面对面生活在一起，使他们在敬畏、恐惧中饱受众神的蹂躏。

苦涩的燥烟尚未飘散，献祭的牲畜还在抽搐，巫师们仍在神坛上呼喊天神，但是，灾难仍然接踵而至，万众在痛苦中悲呼哀号……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以清净慧眼照见雪域藏疆，无数生灵在痛苦中煎熬，便萌生了大悲悯之心，立誓要使雪域众生走上获得解脱安乐的菩提之道。

于是，雪域菩提在寒暑风雨中发荣滋长……。

神 灵 之 域

对外部世界的人来说，青藏高原总是充满了浓浓的神秘气息，这个南起喜马拉雅山北到喀喇昆仑山，西自帕米尔草原，东至横断山区的广袤高原，表现了最为奇特的自然地理外貌，而生活于其间的雪域之子——自称为“博巴”的藏族人所创造的灿烂

文明,由于鲜为外人所深知而更显得神秘和充满魅力。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所说的,越是在自然条件恶劣,越是在人与自然的搏斗最为严酷的地区,恰恰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成熟的文明型态,例如埃及人在尼罗河的肆虐泛滥中创造了古埃及文明,而汉民族则在干涸的黄土高原上培育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同样青藏高原赐予人类的除了贫脊、狂风、严寒外只有那生命绝迹的茫茫雪原,就是在与如此恶劣环境的拼搏中,藏族的先民们艰难而勇敢地掀开一页页文明的篇章。

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应该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核心内容,而最早的认识水平则集中体现在自然的“神性”上,即赋予各种自然因素以神的特性,由此而开始了人类的造神运动。

一般来说,自然条件极端艰苦的地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最为贴近,而给予人类最大威胁的自然因素,则最早成为人们的认识对象,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端落后,社会实践范围的极度狭隘,决定了人们的认识能力简单而低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千奇百怪,先民们曾陷入长久的困惑之中,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苦苦思索,那些奇异的自然力在人们头脑中不断地被幻想加工,终于,人们为心中的无数个“为什么”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神”。人们把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相类比,凭着自我的感受去设想自然物也像人一样具有思想、感情和意志,也有各自的灵魂存在,于是一个个被想象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神灵诞生了。她高兴时赐人以恩惠,愤怒时则降人以灾祸,因而对神必须小心伺候、纳贡献祭。于是,对神灵的祈求和崇拜成为人们最早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唯一方法。

很少有哪个民族像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一样创造了如

此众多的神灵，这也反证出高原环境对藏民族的多种威胁。根据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和延续至今的藏族民间信仰的实际内容，不难发现，各种自然神灵弥布雪域全境，充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大山巨川、古树怪石、飞禽走兽……无不具有神的灵性，浩茫雪域，从天上到地下，神鬼涌集，络绎不绝，是名符其实的神灵之域。

在无法数计的众神之中，对龙神、年神、赞神的崇拜，对上主、家神、灶神、帐篷神的供奉，以及战神、阳神的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

龙、年、赞三神起源于古代藏族人对世界的三分法的观念，即分为天、地和地下。龙神藏语称“鲁”，与汉地的“龙”有区别，泛指生存于地下的神灵，尤其是水中的鱼、蛙、蝌蚪、蛇等动物神。霍夫曼在《西藏的宗教》中指出，这些龙神的最初住所是河和湖，甚至是一些井，它们在水底有家，守卫着秘密的财富。龙神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它是人间 424 种疾病的根源，瘟疫、梅毒、伤寒、天花、麻风病，无不与之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它是一种必须时时敬奉，否则随时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疾病灾难的精怪。

年神在山岭沟谷中游荡，在石缝、森林中安家。年神很容易被人冲犯从而降下灾难，招致疾病和死亡，鼠疫在藏区即称为年病。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四大山神：东方雅拉香波山神、南方孤拉噶日山神、西方诺金岗桑山神、北方念青唐拉山神都是有名的年神。四大山神中，雅拉香波最权威，所以称为“斯巴大神”，据说他曾化现为一头白牦牛与止贡赞普的寡后交合，而生下了英雄茹来杰，开创了吐蕃的基业。孤拉噶日山神在山南，他的妻子是肋萨夫人，骑着一匹插翅飞马，毛洁白如雪，眼红似玛瑙，手持利器，端端正正地守卫着雪域的南方大门。